

## 《虎丘十咏》诗跋形成及东传日本考\*

江 静 许 语

**内容摘要:**《虎丘十咏》是南宋高僧虚堂智愚在苏州虎丘山云岩寺担任藏主期间为虎丘山十景所作的十首七言绝句。从元至明,至少有包括一名日僧在内的十三位僧人为此诗题跋。15世纪末,在云南五华寺住持雪谷宗戒、云南武定望族公子郭省斋和日本遣明使的共同努力下,《虎丘十咏》诗跋传到了日本。《虎丘十咏》诗跋的流传经纬揭示了元明禅林诗文的流播形式、僧人的诗文创作态度以及中国诗文东传日本的某种具体途径与方式。来华日僧历尽艰辛欲将《虎丘十咏》诗跋东传日本的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和禅宗祖师的尊崇,中国僧人促成《虎丘十咏》诗跋东传之举反映了中国僧人弘法东瀛的愿心,这种尊崇和愿心建立在两国共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说明当时的禅宗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东亚的文化,是中日两国共同创造的文化。

**关键词:**禅僧 虚堂智愚 虎丘十咏 遣明使 中日交流

《虎丘十咏》是南宋高僧虚堂智愚针对苏州虎丘山十景所作的十首七言绝句。从元至明,至少有十三位僧人为此诗题跋。这些诗跋在明朝中叶传到日本妙乐寺(位于今福冈县博多市),有部分手稿传承至今。日本元禄十三年(1700),妙乐寺住持绍宙性宗(?-1717)将寺内收藏的古文书编纂整理成《石城遗宝》刊行,其中,收录有《虎丘十咏》诗及跋文十三篇<sup>①</sup>。此外,京都东福寺灵云院藏《集古录》也收录了《虎丘十咏》诗跋,该《集古录》为日本享保五年(1720)丹波瑞岩寺(位于今京都府龟冈市)僧人幹山师贞的手抄本,底本为东福寺住持香林宗寔的私藏本,错漏较多。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亚研究院课题“宋元赴日禅僧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研究成果。

①此版本以下简称“《石城遗宝》元禄本”,原本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驹泽大学图书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等处。本文采用的是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丛书》(凤凰出版社,2013年)所收元禄十三年妙乐寺刊本的影印本。

最早向世人公布《虎丘十咏》部分诗跋手稿图片及收藏者信息的是日本学者田山方南,他在《续禅林墨迹》中收录了灵石如芝的跋,在《禅林墨迹拾遗》中收录了《虎丘十咏》诗及闲极法云、云外云岫、东岩净日、东涧道洵、悦堂祖闾、灵石如芝等六位僧人跋文的手稿图片,同时,附有诗跋的日文译文及解題(包括作者简介、内容、尺寸、装裱形式、收藏者信息等)<sup>①</sup>。川添昭二介绍了诗跋东传及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日本妙乐寺的流传经纬<sup>②</sup>。广渡正利《石城遗宝》译注本收录了元禄本诗跋的原文,个别字与元禄本有不同,同时,将诗跋译成日文,并对其中的专有名词及个别生僻词作了解释<sup>③</sup>。玉村竹二编《诗轴集成》收录了《虎丘十咏》诗跋的全文<sup>④</sup>,该版本以东福寺灵云院藏《集古录》本为底本,同时以元禄版《石城遗宝》本为他校本。渡边雄二介绍了这组诗跋手稿目前所在的最新情况,提供了雪谷宗戒跋文的图片和文字材料,考察了部分诗跋在江户初期的流传经纬<sup>⑤</sup>。伊藤幸司探讨了促成诗跋东传的两名日本僧人石隐宗瑁、恒中宗立在明的行踪与明洪武年间对日政策的关系以及遣明使在诗跋东传中发挥的作用<sup>⑥</sup>。最早将日藏《虎丘十咏》介绍给中国学界的是钱玉成和褚盟萌<sup>⑦</sup>,然而,由于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掌握不够充分,他们提供的信息比较陈旧,而且,认为诗跋由何人因何事携往日本还是未解之迷。此外,胡建明对《虎丘十咏》的书法风格作了分析,认为“完全效法黄庭坚”,“在南宋书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sup>⑧</sup>。

综观前期研究成果,一方面,中国学者对此组诗跋缺乏研究;另一方面,日本学者成果虽然不少,但在诗跋文本的录文与标点上,皆有不少可斟酌之处;对于诗跋内容的解读有欠深入,甚至有误读的现象;对诗跋的流传与东渡缺乏全面细致的梳理,对这一现象反映的问题亦无深入分析。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①田山方南:《续禅林墨迹》,禅林墨迹刊行会,1955年;《禅林墨迹拾遗》,禅林墨迹刊行会,1977年。

②川添昭二:《南北朝期博多文化の展開と対外関係》,《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综合研究(A))地域における国際化の歴史的展開に関する総合研究——九州地域における——》,九州大学文学部,1990年,第43-49页。

③广渡正利编:《石城遗宝》,文献出版,1991年,第43-62页。

④载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942-945页。

⑤渡边雄二:《館蔵“雪谷宗戒墨跡 虎丘十咏跋”について》,《福冈县博物馆研究纪要》第二号,1992年3月。

⑥伊藤幸司:《日明交流与雲南一初期入明僧の雲南移送事件と流転する“虎丘十詠”》,《佛教史学研究》第五二卷第一号,2009年10月,第26-47页。

⑦钱玉成、褚盟萌:《挥毫气焰已凌霄——虚堂和尚〈虎丘十咏〉》,《文物天地》1995第3期。

⑧胡建明:《宋代高僧墨迹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 一、虚堂智愚及其《虎丘十咏》

虚堂智愚，俗姓陈，号息耕叟。淳熙十二年（1185）出生于明州象山（今浙江象山）。16岁出家，嗣法安吉州道场寺（在今浙江湖州）住持运庵普岩（1156-1226）。曾任虎丘山云岩寺（在今江苏苏州）、灵隐寺（在今浙江杭州）藏主。绍定二年（1229），出任嘉兴府兴圣寺（在今浙江嘉兴）住持，后历任嘉兴报恩光孝寺（在今浙江嘉兴）、庆元府显孝禅寺（在今浙江宁波）、瑞岩开善禅寺（在今浙江宁波）、万松山延福禅寺（在今浙江宁波）、婺州云黄山宝林寺（在今浙江义乌）、明州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宁波）、柏岩慧照禅寺（在今浙江宁波）、金文灵照禅寺（在今浙江宁波）以及临安府净慈寺（在今浙江杭州）等。咸淳元年（1265）八月，住持位列五山之首的径山寺（在今浙江杭州）。宋理宗、宋度宗相继归依之。咸淳五年示寂。有《虚堂和尚语录》行世。法嗣有灵石如芝、闲极法云、宝业道源、禹溪一了及日僧南浦绍明、巨山志源等。

智愚担任藏主的云岩寺，位于苏州古城西北的虎丘山上，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二年（387）至十三年间<sup>①</sup>，南宋初年，因高僧虎丘绍隆（1077-1136）在此讲经说法而声名大振。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确立五山十刹制度后，云岩寺位居十刹第九位。

智愚曾就虎丘山十景作七言绝句十首，是为《虎丘十咏》。十景分别是剑池、生公台、花雨亭、千人坐、点头石、憨憨泉、试剑石、吴王冢、白莲池、小吴轩。除吴王冢地址不明，其余九处景点至今仍在，现简单介绍如下：

“剑池”是虎丘山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两岸石壁陡峭，池水寒凜清寂。相传此地是埋葬吴王阖闾的地方，池中有作为殉葬品的吴王生前喜爱的三千宝剑。“生公台”据说是晋末高僧竺道生（生公）说经的讲台。相传道生曾于虎丘寺（云岩寺前身）讲《涅槃经》，讲至精彩处，石皆点头，池水满盈，池中生出千叶莲花。这里的石头便成虎丘的另一景点“点头石”，满盈的池水则是“白莲池”。又传道生讲经使得鲜花如雨般从天而降，“花雨亭”由此得名。“千人坐”又称千人石，坐落在剑池旁，是一块呈铁锈红色的大磐石，平坦如砥。关于千人坐的传说有两种：其一，吴王阖闾的墓造好后，为防止泄密而将一千多名工匠全部处死，溅出的鲜血染红了巨石，日久不褪。其二，竺道生讲经引得千人列坐巨石听法。“憨憨泉”又称观音泉，传为梁朝憨憨僧所凿，据说井水可医目疾。至于“试剑石”，是一块中开如截，酷似剑劈的巨石，一说是吴王试剑处，又说是秦始皇试剑地。“小吴轩”位于云岩寺东南隅，是虎丘山登高眺远之地，可遥看苏州全景。

《虎丘十咏》手稿现藏日本静冈县 MOA 美术馆，其他版本包括：日本方面主要有前面提到的《石城遗宝》两种版本（元禄本、译注本）、《集古录》抄本

<sup>①</sup>孙中旺：《虎丘山寺始建年代考》，《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1期，第55页。

及《诗轴集成》本；中国方面，明僧牧云通门（1599-1671）有《和宋虚堂愚禅师虎丘十咏》，收录了智愚原咏及通门庚和之作<sup>①</sup>。此外，《虎丘十咏》诸诗还散见在明清多种《虎丘山志》中，其中，清康熙十五年（1676）顾涓重修《虎丘山志》<sup>②</sup>被认为是考据精当之作，该书卷二《泉石》录有《剑池》、《憨憨泉》、《白莲池》、《千人坐》、《点头石》、《试剑石》，卷四《古迹》录有《生公讲台》、《花雨亭》、《小吴轩》，卷五《祠墓》录有《吴王阖庐墓》。另外，《全宋诗》“释智愚”条下辑录有九首《虎丘十咏》诗作皆来自顾涓《虎丘山志》<sup>③</sup>。后两种因是辑录之作，各诗排列顺序与原作已有很大的不同。

兹据 MOA 美术馆藏手稿录文于下，同时，注出《石城遗宝》两种版本、《诗轴集成》本、牧云通门本、《虎丘山志》本的不同之处，《全宋诗》本因来自《虎丘山志》，若无特别之处，不再出注。

《虎丘十咏》奉呈社中龙象，幸笑览。<sup>④</sup>

《剑池》：“石壁千寻势嶮巖，下临寒玉浸蟾辉。古今多少凭栏<sup>⑤</sup>者，亲见千将到底稀。”《生公台<sup>⑥</sup>》：“鳞<sup>⑦</sup>皴瘦石笼寒藓<sup>⑧</sup>，千古遗踪意转新。纵使天华<sup>⑨</sup>来堕席，何如緘口过<sup>⑩</sup>残春。”《花雨亭》：“昔人曾此谭<sup>⑪</sup>空有，花雨纷<sup>⑫</sup>纷绕座寒。堪笑空生无伎俩，不曾开口被人瞞<sup>⑬</sup>。”《千人坐》：“苍崖险处坦然平，万指曾来听<sup>⑭</sup>此经<sup>⑮</sup>。若谓生公消息远，一声啼鸟共谁听。”

①牧云通门：《牧云和尚懒斋别集》卷八，《嘉兴藏》第3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600页。

②顾涓：《虎丘山志》，影印清康熙四十一年怀嵩堂刻本，《故宫珍本丛刊》第263册，南海出版社，2001年。

③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三〇一九《释智愚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7册，第35971-35972页。

④此句，《石城遗宝》两种版本（以下简称“《石城遗宝》本”）、《虎丘山志》本未录。

⑤栏，《全宋诗》作“兰”，误。

⑥生公台，《虎丘山志》本作“生公讲台”。

⑦鳞，《石城遗宝》元禄本作“粼”，误。

⑧藓，《诗轴集成》本作“苏”，误。

⑨华，《全宋诗》本作“花”，此处“花”同“华”。

⑩过，《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皆作“送”。

⑪谭，《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谈”，此处“谭”同“谈”。

⑫纷，《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作“缤”。

⑬瞞，《牧云和尚懒斋别集》作“颯”，误。

⑭听，《诗轴集成》本作“殖”，误。

⑮此句，《全宋诗》本作“万指曾此来听经”，误。

《点头石》：“大包才剖碍人间，日炙风吹转放顽。见说听经曾肯首<sup>①</sup>，更须来透铁锤<sup>②</sup>关。”《憨憨泉》：“憨泉一掬清无底，暗与曹<sup>③</sup>源正脉<sup>④</sup>通。陆羽若教知此味，定应天下水无功。”《试剑石》：“云骨深埋草莽<sup>⑤</sup>中，竟<sup>⑥</sup>传秦主试灵锋。旧痕尚<sup>⑦</sup>带春苔绿，一罅能生偃草风。”《吴王冢<sup>⑧</sup>》：“海涌通幽一径深，怪松<sup>⑨</sup>时作老龙吟。阖闾<sup>⑩</sup>覩面无回互<sup>⑪</sup>，空向休空山断处寻<sup>⑫</sup>。”《白莲池》：“灵沼天成非禹凿，玉花时向此中开。游人只爱池中底，不觉香风天外来。”《小吴轩》：“结茆<sup>⑬</sup>初不为孤峰，只爱登临眼底空。风淡云收见天末，始知吴在一毫中。”<sup>⑭</sup>

从后面多位僧人的跋文来看，《虎丘十咏》作于智愚在云岩寺担任藏主期间，其时智愚正当四十馀岁的壮年时期。从智愚“《虎丘十咏》奉呈社中龙象，幸笑览”的题识及后面的跋文来看，此诗当为智愚与僧人们在云岩寺雅集唱咏的产物。从内容来看，《虎丘十咏》应属写景诗，然而，由于吟诵对象多具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全诗洋溢着深厚的临古地、思古人、忆其事、抒其志的咏史怀古气氛。同时，作者的僧人身份，又决定了诗作语言的质木无华以及在吟咏之间宣说禅义，阐发禅理，“以诗说禅”的视角与风格。

## 二、元代《虎丘十咏》跋文的形成

智愚示寂后二十年，从至元二十五年（1288）到大德九年（1305）期间，虎丘山云岩寺约翁礼藏主先后至少请十位僧人为《虎丘十咏》题跋。

第一位僧人是智愚的嗣法弟子，时在苏州荐严寺的闲极法云，他也是《虚堂智愚行状》的编者。其跋文手稿现藏东京出光美术馆，文曰：“先师《虎丘十

①肯首，《诗轴集成》本、《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作“首肯”。

②锤，《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门”。

③曹，《石城遗宝》译注本作“漕”，误。

④脉，《全宋诗》本作“脈”，误。

⑤莽，《石城遗宝》译注本作“奔”，误。

⑥竟，《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竞”。

⑦尚，《石城遗宝》本作“犹”。

⑧冢，《诗轴集成》本作“家”，误；吴王冢，《虎丘山志》本作“吴王阖庐墓”。

⑨松，《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来”。

⑩闾，《诗轴集成》本作“閭”，误。

⑪互，《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迹”。

⑫此句，《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皆作“休向空山断处寻”，当是。

⑬茆，《牧云和尚懒斋别集》本、《虎丘山志》本作“茅”，此处“茆”同“茅”。

⑭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11号图版录文。

咏》，往往<sup>①</sup>司藏日，禅悦游戏耳。倒指六十馀载<sup>②</sup>，想见当时，笑翁会中，胜集如云，赓唱者多矣，胡为此纸独存？礼藏主<sup>③</sup>得之，装背示余，余炷香拜读，不觉堕泪。侍僧曰：‘老和尚顺世已二十年，师亦七十四矣，何愕<sup>④</sup>情之如是？’遂谓之曰：‘汝不闻孝子讳爷名耶？’礼师从旁，研墨蘸笔，请书于轴后，以纪往事，余不复辞<sup>⑤</sup>。至元戊子长至后十日，中吴荐敬不肖法云。”<sup>⑥</sup>根据这篇完成于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夏至后十日的跋文，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点：智愚创作《虎丘十咏》时的身份为藏主；其时笑翁妙堪住持虎丘寺，会下僧众云集，常行雅集之事；约翁礼藏主将《虎丘十咏》手稿装裱后，请法云题跋；法云瞩目思人，生起无限感慨。

第二位僧人是雪岩祖钦的嗣法弟子，时为江西仰山寺（在今宜春）住持的虚谷希陵（1247-1322）。其跋曰：“虎丘十题，虚堂老师在众时作，语铿锵而意逸，未必当时社中龙象有过此作矣。逮其晚年，水落石出，纵意所如信手所<sup>⑦</sup>书，迭宕于规矩之外而不违规矩也，又过此数十倍。客窗玩绎数日，因书此，以俟知言者言<sup>⑧</sup>之与吾言同异何如耳。至元辛卯夏五，住江西大仰山白草虚谷希陵。”<sup>⑨</sup>此跋作于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五月，希陵称《虎丘十咏》“语铿锵而意逸”，评其晚年作品“迭宕于规矩之外而不违规矩也”。

第三位僧人是虚舟普度的嗣法弟子，时在虎丘山隐居的竺西妙坦（1245-1315？）。其跋曰：“言语乃载道之器，先身行之，而后载之言也。此先径山作虎丘十章，脱口皆超逸绝尘，盖其意在言前，用互说处，自然而然。所论笔力老少优劣之殊，山谷所谓周公、孔子不可无小过，过则不害聪明智慧，知言者为如何？元贞丙申，复<sup>⑩</sup>拜于虎丘，题澄<sup>⑪</sup>祖塔下闲房，妙坦。”<sup>⑫</sup>此跋作于元贞二年（丙申，1296），妙坦首先以“言语乃载道之器，先身行之，而后载之言也”之语表明其对文字禅的肯定态度，继而在称赞《虎丘十咏》“超逸绝尘”、“意在言

①往，《石城遗宝》本作“年”。

②载，《石城遗宝》本作“岁”。

③主，《石城遗宝》本作“司”。

④愕，《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作“愤”。

⑤此句，《石城遗宝》本作“余复不辞”，误。

⑥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86号图版录文。

⑦“所”字，《诗轴集成》本无。

⑧“言”字，《诗轴集成》本无。

⑨《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9-10页。另，《诗轴集成》本以《集古录》本为底本，底本错漏处，以《石城遗宝》元禄本校出，已出校者，本文不再注出。以下各跋文同此处理。

⑩复，《石城遗宝》译注本及《诗轴集成》本作“夏”。

⑪澄，《诗轴集成》本作“隆”，当是。

⑫《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10-11页。

先”之余，也认为存在笔力不逮之处。跋文最后所引黄庭坚言论，出自后者针对世人模仿《兰亭序》者中多有“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的现象展开的批评，可见，妙坦除了对《虎丘十咏》作出瑕不掩瑜的评价，更有告诫世人不宜一味模仿前人笔墨之深意。

第四位僧人是直翁德举的嗣法弟子，智门寺（在今浙江宁波象山县）前任住持云外云岫（1242-1324）。其跋文手稿现藏东京出光美术馆，文曰：“径山虚堂和尚在众时作《虎丘十咏》。遗墨尚鲜，诸大老羨其句法精巧，殊不知当时曾于剑池中撝得古剑一口，胆气不弱，将报不平，绕天下开骂人口，为人天师，自此而发，呜呼！览其十咏者，谁复思其剑耶？大德癸卯良月前智门云岫<sup>①</sup>拜题。”<sup>②</sup>此跋作于大德七年（癸卯，1303）十月，表面誉文章胆气过人，实则赞智愚得临济宗风，接引学人机锋峻烈，杀活自在。

第五位僧人是西岩了慧的嗣法弟子，时为明州天童寺（在今浙江宁波）住持的东岩净日（1221-1308）。其跋文手稿现藏静冈县 MOA 美术馆，文曰：“老虚堂《虎丘十咏》，乃其茂年时作也。随境发机，即事显理，平易险峻，模写逼真，想见当时<sup>③</sup>运肘挥毫，气焰已凌霄矣。于时社中岂无他<sup>④</sup>人，而此纸独存，非般若灵验而何耶？礼藏主<sup>⑤</sup>持以见示，恍如坐我剑池，而窥万丈<sup>⑥</sup>之清，毛发森耸，故泚笔以题其后云。大德癸卯佛成道后，天童净日八十四岁，书于方丈之南窗。”<sup>⑦</sup>八十四岁的东岩净日在这篇作于大德七年（癸卯，1303）十二月八日的跋文中，除了称赞全诗写景“模写逼真”，内容“即事显理”，更指出智愚在担任住持之前“气焰已凌霄”，暗示其日后成五山大刹住持之必然。

第六位僧人是虚堂智愚的嗣法弟子灵石如芝（1246? -?）。佐藤秀孝认为如芝当时的身份是台州涌泉寺住持<sup>⑧</sup>。其跋文手稿现藏奈良大和文华馆，文曰：“约翁礼藏主自吴门来游台雁，携径山先师和尚处众时《虎丘十咏》，出以为示。展阅未既，心折涕零。且需下注脚，先师无此语，注脚向什么处下，遂再拜归之。若过雁山访<sup>⑨</sup>静翁，慎勿出此，恩深怨深，翁必讳见。德辰腊初，如芝拜手。”<sup>⑩</sup>德辰腊初即大德八年（甲辰，1304）农历十二月初。作为虚堂智愚的嗣

①岫，《石城遗宝》本作“宙”，误。

②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86号图版录文。

③“时”字，《石城遗宝》本无，误。

④他，《石城遗宝》本作“佗”。

⑤主，《石城遗宝》本作“司”，误。

⑥“丈”字，《石城遗宝》译注本缺。

⑦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88号图版录文。

⑧佐藤秀孝：《灵石如芝の活動とその功績——入元日本僧と鎌倉末期の日本禅林動向を踏まえて》，《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三十六号，2005年10月，第30页。

⑨访，《石城遗宝》本作“谒”。

⑩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116号图版录文。

法弟子,看到先师笔迹,唯有“心折涕零”,“再拜归之”。

第七位僧人是虚堂智愚的嗣法弟子法塞。其跋曰:“笑翁和尚主虎阜,先师典竺坟,搯<sup>①</sup>彼十胜为十咏。约翁踵门,轴而示之,然语墨俱真,不与版行,将恐刺荆于大方之眼,以惑来者乎? 伛指百馀载,岂不肖子随世高下,证其攘羊? 合掌而归诸。德辰腊,法塞拜书。”<sup>②</sup>此则跋语创作时间与前篇同。在此跋语中,法塞交待了智愚创作《虎丘十咏》时的身份,即在虎丘寺笑翁妙堪会下司“典竺坟”的藏主一职。对于智愚诗作“不与版行”,即没有刊刻流行的事实,法塞以“将恐刺荆于大方之眼,以惑来者乎”的反问表达了心中的不满,“岂不肖子随世高下,证其攘羊”之语则表明了他不对先师遗墨作评价的态度。

第八位僧人是时在天台华顶山的东涧道洵。根据田山方南的调查,1977年,其跋文手稿藏在奈良北村家,文曰:“老虚堂《虎丘十咏》中,其一题‘憨憨泉’,末句有云:‘陆羽若教知此味,定应天下水无功。’则其自任之重,宜如何哉? 虽然,惜其壮年之气虽锐而未老且刚也。即今有一句子,抛在面前,过得龙门,风波更湮<sup>③</sup>。设此老人尚住世间,闻余此语,必为点头。约翁藏主洵诸览者,当具择焉。岁乙<sup>④</sup>巳良月,华顶老释道洵书于天台盘陀石上之闲房。”<sup>⑤</sup>《石城遗宝》本和《诗轴集成》本在跋首还有“剑气犹存,石痕未断”之语,据《诗轴集成》本,此句独立成行。考虑到诗跋手稿原为卷子本,后被黑田长政分割装裱的事实,此句很可能是在分割时被错误地分到了前一幅手稿,由于前一幅法塞墨迹今已不存,无法作进一步的考证。此则跋语作于大德九年(1305)十月。东涧道洵认为《虎丘十咏》展现了壮年虚堂的锐气与豪气。

第九位僧人是介石智朋的嗣法弟子,时为杭州灵隐寺僧的悦堂祖闾(1234-1308)。根据田山方南的调查,1977年,其跋文手稿藏在奈良北村家,文曰:“名山题咏,世间未易数,此老虚所作,乃虎丘之职方乘也。然地以人重,人以道显,语以名传。不作名尊宿,则此纸化为游尘久矣。礼藏主<sup>⑥</sup>轴而珍之,名耶? 道耶? 剑池无恙,其自问诸水滨。德已冷泉祖闾拜首。”<sup>⑦</sup>德已当为大德九年(乙巳,1305)。祖闾认为,《虎丘十咏》之所以流传至今,当归功于智愚的盛名,而智愚的名声,则来自他高深的道行。

第十位僧人是石林行鞏的嗣法弟子,时在虎丘的东州寿永(?-1313)。其跋曰:“天泽老人虎丘十题之作,议者唯只取其年岁深远,纸笔故新,为人宝重

①搯,《诗轴集成》本作“搯”,当是。

②《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15-16页。

③湮,《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作“渝”,误。

④乙,《石城遗宝》元禄本作“巳”,误。

⑤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12号图版录文。

⑥主,《石城遗宝》本作“司”。

⑦据田山方南《禅林墨迹拾遗〈中国篇〉》第12号图版录文。

耳。独太<sup>①</sup>白圆应翁谓其随境发机,即事显理,平易峻峻,模写逼真,当时运肘挥毫之时,气焰已凌霄去,可谓知人之言也。大德改元十月二十三日,虎丘寿永拜手。”<sup>②</sup>东州寿永在跋文中引用了东岩净日的跋语,表示对净日看法的认可。日本学者皆言文中的“大德改元”是指大德元年(1297),然而,东岩净日的跋语作于大德七年(1303),此则跋文的完成时间不可能早于此,因此,此处的“大德改元”应是继大德年之后的至大元年(1308)。

上述十位僧人中,闲极法云、灵石如芝、法塞等三人作为虚堂智愚的嗣法弟子,他们的跋语基本是表达对先师的怀念,没有对诗文的评价,其余僧人的跋文除对《虎丘十咏》给予较高的评价,也有对智愚过人胆气的赞赏,对于前辈名僧,这样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吧。

元代《虎丘十咏》诗跋的作者既有承虚堂法脉者,亦有他派高僧;题跋的创作时间始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终于至大元年(1308);题跋创作地点明确者,涉及江苏苏州虎丘山、荐敬寺,江西宜春仰山寺,浙江杭州的灵隐寺和径山寺,浙江台州华顶寺,浙江宁波天童寺等多处寺院。约翁礼藏主二十年间携带《虎丘十咏》奔波江南各地,遍参高僧,请人题跋的虔诚与执着,跃然纸上。

### 三、明代《虎丘十咏》跋文的形成与东传

约翁礼藏主示寂后,《虎丘十咏》诗跋一度下落不明。元末明初,日僧石隐宗珙、恒中宗立来华游学。关于两位日僧来华的具体时间,伊藤幸司认为,鉴于明朝初年明太祖实行海禁与朝贡相结合的对日政策,日本僧人不能自由来华,两人只能是随洪武四年(1371)或七年的遣明使来华<sup>③</sup>。可是,季潭宗泐在给恒中宗立的诗中称其“海外趁商船,江东住几年”<sup>④</sup>,明确道出宗立是搭乘商船来的中国。木宫泰彦认为,在永乐勘合贸易条约缔结以前,存在着三三两两搭乘商船到中国来的求法僧<sup>⑤</sup>。根据他所作的《入明僧一览表》<sup>⑥</sup>,明朝初年的确存在着不随遣明使来华的日本僧人,可以设想,在明太祖实施海禁之前,依然有日本商船往来于中日两国间,因此,宗珙、宗立应是搭乘元末明初的商船来到中国。

宗珙、宗立生平不详,只知皆为月堂宗规(1285-1361)的法嗣,曾相继担任博多妙乐寺第七、八代住持。月堂宗规为南浦绍明(1235-1308)的嗣法弟

①太,《石城遗宝》本作“大”。

②《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14-15页。

③伊藤幸司:《日明交流与雲南一初期入明僧の雲南移送事件と流転する“虎丘十詠”》,第40页。

④释宗泐:《全室外集》卷五《赠立恒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5页。

⑤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87页。

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88-604页。

子，而虚堂智愚则是南浦绍明在宋留学时的嗣法师，因此，宗杲、宗立为智愚三世法孙。

至于妙乐寺<sup>①</sup>，前身为日本正和五年（1316）创建的石城庵，开山住持即为月堂宗规。位于博多息滨的妙乐寺与中国关系颇为密切。在宗杲和宗立之前，三世住持无我省吾（1310-1381）、四世住持无方宗应（生卒年不详）皆曾来华留学。日本贞和二年（1346），无我省吾在妙乐寺建吞碧楼。洪武七年（1374），杭州灵隐寺住持见心来复（1319-1391）应再次入华的无我省吾之请，作《石城山吞碧楼记》。此外，了庵清欲（1268-1383）、楚石梵琦（1296-1370）、良琦、文信、王幼倩、守仁、仲谦、竹庵怀渭（1317-1375）等元明僧俗以及赴日明使祖闾仲猷、无逸克勤、朱本和赴日僧俗东陵永珣（？-1365）、陆仁等凡十三位中国人为吞碧楼题诗<sup>②</sup>。根据这些诗作，可知妙乐寺是明朝使臣及往来于中日间的两国僧俗曾经造访之地。或许正因如此，室町时代相继担任京都真如、建仁、南禅等名刹住持的高僧天隐龙泽（？-1500）在其《默云集》中称妙乐寺“为遣唐使驿”<sup>③</sup>。此处的“遣唐使”，是指遣明使。

正如伊藤幸司指出的，入明后，宗立、宗杲在江南一带巡礼，宗立与南京文人史谨、苏州文人王行等皆有诗文交流<sup>④</sup>，或许是在此过程中，宗立从“好事者”手中购得了《虎丘十咏》<sup>⑤</sup>。洪武九年（1376），径山寺住持象原仁淑应宗立之请为《虎丘十咏》作跋曰：

虚堂老人《虎丘十咏》，乃在众日，禅寂之暇，遗习未除，游戏翰墨，示其流辈耳。若其佩运庵之法印，号令人天，开凿盲聋，如际天之洪涛，岂可窥其涯涘哉？先辈诸老，皆为之发扬矣。日东恒中立西堂，受业师法嗣虚堂，盖法门师孙也，购之好事者，俾书其末。因作而言曰，此公家旧物，携归本国，希世之宝也，宜善加护焉。洪武九年，岁在丙辰夏六月几望日，径山比丘天台仁淑<sup>⑥</sup>拜首敬书。<sup>⑦</sup>

根据这篇作于洪武九年（1376）六月十四日的跋文，仁淑对于智愚作《虎丘十咏》似乎颇不以为然，认为是“遗习未除，游戏翰墨”之举，因此，对于诗文好坏

①以下关于妙乐寺的介绍，主要参考广渡正利《石城遗宝》第7-38页。

②这些诗作一度藏在妙乐寺，后与日本人的作品合为《吞碧楼题咏》，收录在《石城遗宝》中。

③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第五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044页。

④史谨：《独醉亭集》卷中《送立恒中上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第124页。王行：《半轩集》方外补遗《思缓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66页。

⑤伊藤幸司：《日明交流と雲南一初期入明僧の雲南移送事件と流転する「虎丘十詠」》，第40页。

⑥淑，《石城遗宝》译注本、《诗轴集成》本作“叔”，误。

⑦《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16-17页。

未作评价,另一方面,对智愚承先师运庵普岩法脉传教弘法、度化众生之举则大加赞赏。最后,仁淑嘱咐宗立将此禅林重宝传到日本后,好好珍惜,善加保护。

伊藤幸司认为,从洪武年间任云南府学教授的虞堪《赠日本僧立恒中藏主》以及流放云南的日本僧机先鉴所作《寄西山石隐》、《寄石隐》等诗作来看,宗珣和宗立到了云南应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他们到云南的原因,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洪武十九年,所谓“林贤通倭事件”发生之后,明太祖断绝了与日本的往来,之前来华的大量日僧被软禁在南京天界寺,之后,这些僧人又被流放到云南,宗立和宗珣也因此到了云南<sup>①</sup>。明初有日本僧人被遣谪云南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流寓云南的也不只是流放僧,还有游方僧<sup>②</sup>,因此,似乎不能断定宗立和宗珣到云南是因遭遇流放。

根据《石城山前住籍》的记载,宗立于永乐十年(1412)十月二十三日在明圆寂,《虎丘十咏》及相关跋文因此传到了宗珣手里。永乐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宗珣去世,弥留之际,他为此墨迹题跋云:“虚堂禅师四代孙,日本妙乐寺僧八十七岁宗珣,得先祖遗墨年深,若有日本僧来,付此字,寄日本妙乐寺,余了愿心也。”<sup>③</sup>表达了希望有日僧将此墨迹带回妙乐寺的宿愿。

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虎丘十咏》历经辗转,于成化十三年(1477)传到了滇城五华寺僧雪谷宗戒手里。五华寺位于云南昆明,元至元初建,所谓“云南诸刹,惟此为最”<sup>④</sup>,是当地颇具规模的大寺,日僧昙演曾在寺内建聚远楼<sup>⑤</sup>。宗戒生平不详,只知曾为五华寺住持,并在寺内建旷怡楼<sup>⑥</sup>。从他在下面的跋文中称智愚为“老祖”,称自己为“远孙”来看,应是虚堂智愚的若干世法孙。宗戒在托人将此墨迹带往北京之前,为之作跋曰:

拜读虚堂老祖所作《虎丘十咏》,古今之绝唱也。大元时江南诸尊宿辈,皆羨跋于后,诚法门至宝。日东师恒中立翁、石隐珣翁二师,念先祖遗墨,欲寄归本国,传为<sup>⑦</sup>盛事耳。今经八九十年,流落于滇,不果所愿。大明成化丁酉,远孙比丘宗戒偶获一睹,方知先辈用心如此。所以古人片言只字,莫非金玉,未敢轻弃也。一日,武定公子省斋郭君归金台之便,顺携此

①伊藤幸司:《日明交流与雲南一初期入明僧の雲南移送事件と流転する「虎丘十詠」》,第40-41页。

②王叔武:《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59-65页。

③《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6册,第17-18页。

④李贤、彭时等:《大明一统志》卷之八十六,天顺五年(1461)刻本,第5269页。

⑤陈文编《云南图经志书》卷一《楼阁》称聚远楼“先时日东僧昙演所建”(影印景泰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⑥《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寺观》称旷怡楼在五华寺西南,“僧宗戒所建”(《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第16页)。

⑦为,《石城遗宝》本作“而”,误。

卷还京,待日本朝覲僧诣阙,将此卷付之持归本国妙乐寺,以了先师之愿。跋跋于后<sup>①</sup>卷末以俟。滇城五华六十七岁远孙比丘雪谷宗戒谨识。<sup>②</sup>

此跋文手稿现藏九州福冈市博物馆。文后所钤“前五华住山”之印揭示了宗戒当时的身份是五华寺前住持。跋文中,他称《虎丘十咏》为“古今之绝唱”,为“法门至宝”,对于中立、宗巧两位日本僧人立志将先祖墨宝东传日本的决心颇为感佩。为实现先人遗愿,宗戒托武定公子郭省斋将《虎丘十咏》诗跋带到“金台”,等“日本朝覲僧诣阙”时,再托他们带往妙乐寺。

关于武定公子郭省斋,之前的研究皆只知提到他云南武定人,其余情况不详。其实,他应为明朝开国元勋郭英(1335-1403)的后人,家世颇为显赫。洪武十七年(1384),郭英以“平云南功,封武定侯”<sup>③</sup>。此后,其孙郭玪、郭珍及郭珍之子郭昌相继袭封武定侯,其中,郭昌于天顺元年(1457)袭封,其子郭良于弘治十五年(1502)袭封。成化丁酉年(1477)之后数年间,武定侯应是郭昌。至于郭省斋,应是郭英家族中,最有可能是郭昌之子中斋名为“省斋”者,其名不可考<sup>④</sup>。

跋文中的“金台”,日本学者皆以为是南京,笔者以为,“金台”应该是指北京。首先,元明文献中已有称北京为金台的例子。例如,元汪泽民、张师愚同编《宛陵群英集》卷四《送王月溪提点南归》云:“前年驰骑入京城,金台露坐思诗清。”元代京城在今北京。明沈榜《宛署杂记·铺行》曰:“当成祖建都金台时,即因居民疏密,编为保甲。”所谓建都,是指建立都城,明成祖朱棣虽是在南京登基,其所建之都却是北京,因此,此处的“金台”应指北京。此外,跋文“顺携此卷还京,待日本朝覲僧诣阙”中的“京”、“阙”是指京城和皇宫,当时皆在北京。事实上,自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后,遣明使即往北京朝覲。鉴于上述理由,此处的“金台”应该是指北京。

文中所谓“日本朝覲僧”,伊藤幸司根据跋文中出现“成化丁酉”年,即日本文明九年的提示,认为应是日本文明八年(成化十二年,1476)来明的遣明使。此次遣明使于日本文明八年四月从堺市出发,成化十三年九月前到达北京,在北京完成朝覲仪式后,于次年二月以后离京,七月二十五日之前离开宁波返日,途中一度漂到济州岛,十月抵达日本。伊藤幸司认为,该次遣明使团虽然未经博多回到了堺市,但是,《虎丘十咏》诗跋也可能通过堺市的大应派(派

①“后”字,《石城遗宝》本、《诗轴集成》本无。宗戒墨迹中,该字右边有“卜”符号,表示删除。

②据渡边雄二《馆藏〈雪谷宗戒墨迹 虎丘十咏跋〉について》所收宗戒墨迹影印图版(第99页)录文。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三〇《郭英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821页。

④此段关于郭省斋家世的介绍,承台州学院高平副教授赐教,在此谨表谢意。

祖南浦绍明)寺院传到博多妙乐寺<sup>①</sup>。此说虽然可能成立,但是,笔者以为,跋文中出现的“成化丁酉”年是宗戒得到《虎丘十咏》诗跋的时间,未必是题写跋文的时间,第十三次遣明使于该年九月前到达北京,次年二月以后离京,从宗戒得到诗跋到委托郭省斋携往京城,直至交给遣明使,这一系列过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因此,还有可能是日本文明十五年四月从堺市出发来明的遣明使,此次遣明使于两年后的十二月返回日本五岛奈留浦,次年七月抵达堺市,采用的是途经博多的中国路<sup>②</sup>。在经过博多时,可能将《虎丘十咏》诗跋交给了妙乐寺。

在宗戒、郭省斋和遣明使的共同努力下,《虎丘十咏》诗跋终于在15世纪末传到了日本。至于之后的流播情况,根据川添昭二、广渡正利等人的介绍,大致情况如下:妙乐寺在日本天文七年(1538)、永禄二年(1559)、天正十四年(1586)三度遭遇火灾,几近全毁。包括《虎丘十咏》诗跋在内的寺内多件元明高僧的墨宝一度由寺院信徒、博多富商田中绍府保管。江户时代初期,诗跋传到筑前藩(今福冈县西部一带)藩主黑田长政(1568-1622)手里。长政将《虎丘十咏》诗献给了幕府将军德川秀忠(1579-1632),秀忠又将之赐给了曾任幕府大老的酒井忠世(1572-1636)。《虎丘十咏》跋在长政手中被分割装裱,部分被赏赐给家臣。幸运的是,部分诗跋手稿留传至今,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

#### 四、结语

《虎丘十咏》诗跋为我们了解元明禅林诗文的流播形式以及僧人的诗文创作态度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案例。《虎丘十咏》诗跋的东传经纬揭示了元明时期中国诗文东传日本的某种具体途径与方式。来华日僧历尽艰辛欲将《虎丘十咏》诗跋东传日本的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和禅宗祖师的尊崇,中国僧人促成《虎丘十咏》诗跋东传之举反映了中国僧人弘法东瀛的愿心,这种尊崇和愿心建立在两国共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说明当时的禅宗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东亚的文化,是中日两国共同创造与信奉的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虎丘十咏》所题跋文皆未见载于中国文献,却或是原稿被保存在日本,或是内容被日本文献所收录,这种现象再次提醒我们应关注并深入挖掘逸存海外的中国文献。

【作者简介】江静,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许语,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语言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

①伊藤幸司:《日明交流与雲南一初期入明僧の雲南移送事件と流転する「虎丘十詠」》,第42页。

②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38页。